



现在与未来

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约翰·迈克斯威特 (Mohn Micklenthwalt) 著
爱德瑞恩·伍德里奇 (Adrian Wooldridge)
盛健 孙海玉 译

THE CHALLENGE AND HIDDEN
PROMISE OF GLOBALIZATION

A
FUTURE
PERFECT



现在与未来

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英] 约翰·迈克斯威特

著

爱德瑞恩·伍德里奇

盛 健 孙海玉

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字：01-2000-41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与未来：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 (英) 迈克尔斯维特，
(英) 伍德里奇著；盛健，孙海玉译。 - 北京：经济日报出
版社，2001.1

ISBN 7-80127-809-7

I . 现… II . ①迈… ②伍… ③盛… ④孙… III . 全球学 - 研究
IV .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136 号

A FUTURE PERFECT

Copyright ©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现在与未来——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作 者	约翰·迈克斯威特	爱德瑞恩·伍德里奇
译 者	盛健	孙海玉
责任编辑	陈佩	
责任校对	纪威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	13.625 印张	
印 数	1—8000 册	

ISBN 7-80127-809-7/Z·13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前　　言

这篇前言草就于从洛杉矶飞往纽约的航班上——当时，我搭乘美国制造的飞机，一边享用美国航空公司的服务，一边用美国出产的电脑完成一位美国出版商要求的“功课”。其实，兰登书屋已经被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收购；IBM 手提电脑是在墨西哥制造的；波音 757 由来自近 40 个国家的零件组装而成；而 Delta 航空公司似乎正在和若干外国承运商讨论代码共用合约。

在飞机坐椅的背面，安装有“空中电话”设备，乘客可以用它致电到全球任何角落，只要能够忍受近乎掠夺的收费：每分钟 5 美元。不过，这个价格和 20 年前相比，已经算是难以置信的便宜了。如果我的电脑技能过关，完全可以使用随身携带的电脑通过“空中电话”上网，回复远在泰国的同事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是在早上使用电脑收听莱斯特城的足球比赛时（在妻子可怜兮兮的目光中）收到的。比赛结果是那个拥有法国得分手、牙买加后卫、希腊中场队员、冰岛进攻队员的球队以三比一战胜了英格兰的阿森纳队。

环视左右，无论身在何处，你都会很快地发现我们这个世界正在越变越小。正如我们将要阐明的，全球化既非新事物，也不完全——当然也不是不可避免。收听几英里之外的足球比赛转播就足以证明地方联系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IBM 还是一家美国公司。在真正全球化的市场中，Delta 航

空公司当然可以购并外国伙伴，而不是寻求尴尬的联盟。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些本质的变化正在侵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相信，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复杂的过程，它的每一个要素——从全球文化的美国化、民族—国家的终结到全球化公司的大获全胜，都被卷入了辩论的漩涡。然而，人们似乎一直怯于从全方位的角度去审视全球化。经济学家过分纠缠于资本的流动，却忽视了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和社会的断层；左翼人士认识到资本主义过度扩张的负面影响，而数码预言家们则沉迷于世界被网络和电缆编织在一起的乌托邦幻梦。商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更有血有肉些——企业和商品是连接世界的最有形的载体——但他们太计较利润的得失，无法从更宽广的角度理解和描述。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达到两个也许不可能实现的平衡：第一，本书要涵盖有关全球化这一主题的所有根本性的论断，然而，我们希望用活生生的人、企业、甚至宗教团体的经历来加以揭示；第二，我们试图创作一本观点鲜明的作品，但作者并非主角。这些主题、论断以及人物是如此鲜活，相比之下，喋喋不休地描述我们住过哪家酒店，吃过什么美食，收听过几场足球比赛，将是多么乏味。因此，在梳理好所有的脉络后，我们立即抽身而退。

同时，全球化这个主题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多样性。我们时而置身巴黎，一边嗅着好闻的烟味，一边聆听珍妮·莫罗有关法国电影业的妙语；时而来到纳尔瓦的桥上，向把我们当作爱沙尼亚间谍的俄罗斯老太太大声发问；前一刻，我们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严肃地探讨全球化问题，没

过多久，我们又要记录下斯蒂芬·赫希这位色情业巨头对全球化的高谈阔论。简而言之，我们从与很多人的交谈中获益良多，其中包括给洛杉矶的阴暗角落带来活力的中国移民查理·吴，在索维托经营“电话商店”的镶金牙的约翰逊·特伯拉。这些普通人对我们的价值远远超过政治大人物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全球化引导我们理解身处的这个世界正变得有多么小（通过电子邮件，两个远隔几千英里的人可以合作写书）又多么大（推崇全球化的咨询顾问们竟很少乘经济舱旅行）。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常被两种悲哀攫住。第一种悲哀在于我们不得不舍弃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大量有趣并令人兴奋的故事，仅仅由于它们没有完全切题；第二种悲哀在于我们在本书中记述的这些人物——无论是圣保罗的贫民窟住户，还是密歇根弗林特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多数是我们为之叫好的全球化的受害者。

但是我们仍然要为全球化鼓掌助威。因为本书的核心在于揭示全球化不仅需要理解，而且需要强有力地捍卫。全球化的反对者擅长用甜美的嗓音蛊惑人心。当支持者们忙于审视贸易流动的结果时，受害者们常常利用破碎的家庭、关闭的工厂、失业的工人等形象来博取同情。我们并非视而不见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相信许多罪恶应该记在政治恶棍、而非全球化的头上。全球化是一个野蛮的过程，它同时是一个令人受益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者的数量将远远超过受害者。

本书的主旨之一在于将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排列目录拉入到对现代自由的本质的讴歌上。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好象步入了时间机器：我们呼唤着“前

进、前进”，试图辨别全球化创造的社会类型，其实，我们回到了19世纪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全球化时代，甚至回溯到现代自由思想更久远的起源。在一本讲述美好未来的书中，太多的回忆也许显得很古怪——尤其是回忆这些伟大的名字：洛克、杰弗逊、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皮尔、洛克菲勒。但是我们必须回忆，因为他们和今天息息相关。而且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和我们从旅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获得的结论完全一致：全球化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一个人性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必须依靠自己的斗争而非他人的施予。

本书的出版得力于很多不幸而慷慨的人们。他们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其中我们要特别提到两类“受害者”。一是《经济学家》杂志，没有它15年来的支持，在写作这样一本有关全球化的作品时，我们无法获得更好的经验和资料。我们要特别感谢《经济学家》的主编比尔·埃默特先生，他容忍我们拿出大量的时间为本书做调研，而且允许我们在本书中使用我们多年来为杂志撰写的作品。

第二类“受害者”则承受得更多。自古以来，人们在自己作品的“致谢”中，总是虚伪地提到两个名字。其一是写作者的太太——“她总是期待着新章节的完成，而且憧憬新的旅行”。我们只想说，我们非常感谢——还有点儿吃惊——费萝妮亚和阿米莉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其二是写作者的孩子——他们安静地坐在父亲膝头，激励和帮助写作者。而事实是，爱拉、汤姆、盖伊、爱德华使尽种种解数干扰我们的写作，因为他们被彻底忽视了。当然，他们都还不满3岁。无论未来完美与否，都是这些孩子的未来。因此，我们将本书献给他们。

序

现在与未来

一天中总有一两次，布鲁德霍夫镇乡野的宁静会被大卡车隆隆的轰鸣声打破。这个纽约州北部瑞夫顿城附近的偏僻小镇，是一个类似阿门宗派的宗教社区。社区中的 400 个“兄弟”（成员之间相互称兄弟）出于对丧失信仰的现代社会的厌倦而隐居于此。在社区中，不许使用收音机、电视机，禁止离婚和同性恋。施行所谓的“基督教共产主义”。要求成员放弃私人财产并共同抚养社区的所有儿童。尽管每个家庭都有分配的宿舍，但社区的兄弟们习惯于聚集在一起吃饭或做其他杂事。妇女们被要求恭从丈夫，负责家务劳动，外出时还得蒙上头巾以示贞节。

美国文化在全世界的横冲直撞使兄弟们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好莱坞宣扬道德沦丧；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玷污了孩子们的纯洁心灵；而二者鼓吹的物质至上摧毁了人性中最宝贵的价值。越来越多曾经像布鲁德霍夫一样简单宁静的社区正被现代工业和流行文化侵蚀。只有另外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岛国——古巴，还可以作为社区儿童度假的去处。

即便如此，布鲁德霍夫并不比古巴好多少，它也不得不

向现代社会敞开大门。从历史上说，它自有其国际化的优势。本世纪 20 年代，布鲁德霍夫在德国创立，但它倡导的共产主义理念和反传统的教育方法惹怒了纳粹，导致成员们四处流亡。一些人羁留在英国南部，另一些先到拉丁美洲，又辗转去了美国。目前，2500 名成员中的大多数生活在英国（主要集中在两个聚居地）和美国西北部（有六个聚居地）。尽管身处异地，他们通过成员的迁居和共同处理社区事务来对抗地理距离的疏离。当然，现代技术也简化了以上过程——从过去依靠信件和偶尔的电话交流，到今天使用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八个聚居地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尽管只能在工作中使用现代科技，但布鲁德霍夫对其的态度已比阿门宗派宽容很多。）

让各处的兄弟们联系更密切的另一个因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商业。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社区创办了社区玩具公司，制作精美的儿童玩具；到 70 年代，又创建了瑞夫顿设备公司，生产残疾人专用设备。因为兄弟们坚持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要参与生产的全过程（同时排斥任何外来者），导致生产出的玩具价格昂贵，但这保证了所有人的生计。这种虚幻的繁荣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直到遭遇国外的竞争压力。竞争对手将手工生产的优势运用到规模生产中，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同时他们也碰到了自身生产过程中的“瓶颈”问题。

兄弟们在各地召开了一系列“危机”研讨会。有人提出既然已经摆脱了贫困，就不必在乎收入的减少。另一个年轻人则认为社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从他们曾经嘲笑的商业生活中汲取经验。

约翰·诺德是社区中的刻板人物，他成人后的时间都在

这里度过，常年穿着和同伴们一样的灰暗外衣。尽管声调柔和，却丝毫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坚定信念，尤其是对死刑和同性恋的仇视。但在另一方面，他的确与众不同——他痴迷于商业理念，并最终委婉地说服了狐疑的同伴们借鉴日本的经验，把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化转化成某种优势。

尽管开始并不情愿，布鲁德霍夫还是逐渐接纳了日本的管理技术。每个社区被转换为专业中心，分别负责金属件和木制品的加工。他们引进了“精干生产方式”，分割组装线，细化劳动力（每人负责组装整个产品），并要求供货商及时提供零配件。正是这种即时供货系统使得小镇的宁静常常被卡车的轰鸣声打破。

由此带来的高效率相当惊人。布鲁德霍夫发现他们只需要一天就可完成 60% 定单，而在同行业中，这个周期通常是四星期。库存也减少了 90%。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把工作视为祈祷方式的集体中，工作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他们从最初的拒斥者成为现代管理的积极参与者，并热衷于去世界各地取经。从日本借鉴的另一个管理方法 Kaizen 还帮他们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他们甚至大胆吸收美国的管理方式——再生产——减免工人 20% 的劳动量以使其参与对生产过程的监督。他们还引进电脑化管理，将美国和英国的工厂纳入同一系统。

外来的观念不但更新了布鲁德霍夫的生产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社区成员和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例如，过去兄弟们销售产品时不愿意和客户见面，但现在的“客户中心管理法”要求他们必须意识到客户即使不能和供货商见面，至少也应知道姓名或有声音的沟通。因此社区组织了客户管理小组（成员多数为女性），负责和特定的客户如残疾人学校等

建立紧密的联系。布鲁德霍夫甚至购买了一架私人飞机，在不用承担社区任务时，租借给莎朗·斯通和汤姆·克鲁斯这样的影星。

租借飞机给超级明星却禁止观看电影、使用电子邮件却不允许孩子们学电脑，布鲁德霍夫当然明白这很滑稽。但他们亦有回报：孩子们仍给政治犯和死刑犯写信；妇女们一如既往的恭顺；商业蓬勃发展，1999年的净收入达到4000万美元，且定单仍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布鲁德霍夫忙于在全球范围内转换这笔意外收入。目前澳大利亚的一个新社区正在建设中。他们相信市场既是罪恶之源，也同样能创造善行。

即将坍塌的围墙

布鲁德霍夫并非是被外部世界的力量彻底改变的惟一绝缘体。不言而喻，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横扫全球的经济一体化不但重新规划商业格局，也势必重新构造个人生活，包括划分新的社会阶层，提供工作机会，创造难以想象的财富；当然，偶尔也带来悲惨的贫困。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政治家们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度越来越影响到对他们的评价。未来几年中，无论伊斯兰和西方世界，欧元怀疑论者和欧元支持者，新左翼和旧左翼，其相互之间的政治争论无非就是一个基本冲突的变形。这个冲突存在于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塑世界的全球一体化论者和力求保持传统文化及地方独立性的传统论者之间。

正如我们所见，全球化既非新东西，也远未完善。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该现象日趋明朗。许多亚洲人都不能忘记或

原谅这样一幕：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歇尔·康德苏双手环胸，像个慈善的班主任；站在他面前的是满脸不情愿的学生——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他刚刚签署了一份把印尼从破产边缘挽救回来的协议。许多美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5万多名装扮怪异的示威者把西雅图变成战场，只是为了表达对一个无形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愤恨和不满。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球迷们至今还对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引进球员数量超过本地球员的那个赛季耿耿于怀。作为纽约该机构分支的瓜根海姆博物馆在毕尔巴鄂（西班牙港口城市）城落成时，由于出自洛杉矶设计师之手而引起强烈反响。下面还要提到的巴西街头魔术师西瓦尔·达西瓦现在栖身于圣保罗的贫民窟。他事业的厄运始于1998年被全球一体化带来一位美国魔术师在电视上对魔术技巧的揭示。而对于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人们来说，新世界是伴随着可口可乐、麦当劳汉堡、洗碗机以及众多难以想象的新事物一起到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一词被赋予各种想象的涵义。一时间，人们言必称“全球化”，但无人能确切定义。政客们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以为它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词；对法属地和亚洲领导人来说，它意味着美国的控制；对参加西雅图抗议的蓝领工人来说，它揭示了美国的无能。无论如何，以上种种定义说明大多数评论人看待全球化的角度仍是狭隘和局限的。

定义混乱的后果之一是在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同时，对其反对之声也日趋强烈。批评者们担心这个星球最终将成为国际投机者的乐园：单一的机场文化取代地域文化，民主不复存在，各国政府为讨好并不可靠的公司而不得不降低税收、利润和对环境的保护。当然，有些批评毫无价值。马来西亚

总理马哈蒂尔把 1997 年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归咎于乔治·索罗斯，他认为后者出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接纳缅甸而对该地区实行报复。大多数亚洲人都相信马哈蒂尔。然而，全球化的批评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还包括索罗斯）提出了更重要的观点。全球化应该接受谴责——有些谴责不无道理：全球化造成了企业内部的不平等（美国企业老板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419 倍），国家内部的不平等（270 万美国最富有者的收入相当于一亿贫困者的总收入）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最富有国家瑞士的人均收入是莫桑比克的 400 倍）。

同时，全球化的支持者们不断被来自内部的问题困扰：全球化组织联合国持续软弱；全球化在国家问题上纠缠不清，例如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赤字，英国对欧元的游离态度；以及 90 年代后期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在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代表着一段难堪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英美世界的根基。当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国民每周至少节省两天的食物，当俄罗斯士兵和领取救济金的人被迫去挖土豆时，很难说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的成果。

信心危机不仅仅源于经济。全球化将各国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唤醒了古老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如果说独立呼声在魁北克和苏格兰带来的是小麻烦，在其他地区则演变成流血冲突。发生在美国世界贸易中心、亚特兰大奥运会、俄克拉荷马城的三起爆炸案，就是由妄图打破世界新秩序的恐怖分子一手策划的。全球化还导致了其他残忍事件。下面一封电子邮件发自一个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女孩，她亲历了 1998 年 5 月的印尼暴乱。在这场暴乱中，1000 多人丧生。这场暴乱也直接导致苏哈托的下台。

他们四处烧毁我们这些华裔穷人的房子，12—14岁大的孩子扔石头，逼我们打开房门，然后女人、祖母，甚至是5岁的小孩都冲进来抢夺物品。这里每天发生几起强奸事件。我们是传统的替罪羊。

大混乱

本书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澄清有关全球化的事实、形象和观点。很多人以为全球化带来了商品的全球化，比如可口可乐（事实是可口可乐公司为讨好日本消费者而调整配方）；全球化消灭了通货膨胀，改变了商业规则；全球化的大公司轻而易举地挤跨小公司；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地理位置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而本书就是要揭开笼罩在全球化上的这些神秘面纱。与其说全球化是一场有计划的、协调一致的运动，或更错误地视其为既成事实，不如说它是更像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波动。驱动全球化的三种力量——信息数字化、贸易壁垒的崩塌和流行音乐的传播——虽然已相当强大，但仍不足以使全球经济达到令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可的紧密程度。

用某些尺度来衡量，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甚至还不如一个世纪之前。20世纪的后20年主要是收复前75年的失地。而在此之后，谈论“地球村”仍为时过早。有时，观察家恰恰忽视了某种潜流，它把人们汇集在一起，也能将人们冲散。例如，多频道电视技术不但催生了CNN、MTV这些全球性的电视网，也使无数社区电视台成为可能。

将全球化作为既成事实的人犯了夸大其辞的错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确实越来越灵活和自由，但也并非像亚洲领导人所惧怕的那样无遮无拦。许多国家还完全没有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部分商品市场仍局限在国内：加拿大某省和另一省之间的商品交易额是其和美国相同规模的某州的 12 倍，而服务贸易额则高达 40 倍。在所谓完全开放的欧共体市场，人们与本国贸易伙伴交易的可能性为 6 倍。企业将厂址固定在某个地点，虽嫌偏执却不难理解。好莱坞并非电影制片商最经济的选择，但它的人才环境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在美国，大部分基本产品都在国内生产，包括电灯泡，这主要是考虑到把工厂搬到国外去必须承担的高额运费。

无论美国政治家们如何描述世界完全失控的情景，微观经济统计数据展示的则是另外一幅画面。事实是海外事件对美国本土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太大影响。例如，日本停止购买美国产品只会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对整个亚洲的出口仅占到美国经济的 2.5%；亚洲经济在 1997 年遭受危机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只是略做震荡，便一路向上。对证券商来说，国外事件对美国出口下降的影响并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美联储或许由此放弃升息的决定。

如果夸大其辞是种错误，那么过分怀疑也不恰当。全球化或许还算不上既成事实，但许多事情确实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演变。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刚爆发时，比尔·克林顿用所谓尼克松教义轻描淡写地评论了泰国的局势。但是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 1998 年 9 月说亚洲金融危机是“半个世纪来全球所面对的最大的金融挑战。”这得到了西方许多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附和。许

多人曾宣称亚洲的业务仅占其利润的 10%，但很快承认公司的利润增长主要依赖于亚洲。

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引人注目的保尔·克鲁格曼——大肆批评全球化。我们同意其中对全球化数据证据的某些批评意见，但也不能一叶障目。全球化不仅改变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它关乎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否可以随意地拨打国际电话，通用汽车密歇根工厂的工人对奔驰公司收购克莱斯勒的态度，在上海的咖啡馆是否能品尝到一杯地道的咖啡（或许还可以上网），以及攀登珠穆朗玛的登山者能否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小村庄享用有法国吐司和瑞士甜点的早餐。

本书中提及的大多数企业，包括布鲁德霍夫的玩具公司，其产品仍主要销往国内市场，但它们遵循的生产标准以及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全球性的。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全球化并不是选购国外汽车或电脑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应该拥有的一种权利。而很多情况下，它对本国市场的影响远非市场份额等数据所能体现。麦当劳在亚洲食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但亚洲的社会学家发现它已经影响并改变了很多小的社会习俗，包括孩子们的生日；（以前，很多地方没有为孩子庆贺生日的习惯。而现在，孩子们把在麦当劳举行生日聚会看作一种荣耀。）香港人的排队就餐（过去常常是挤做一团）；日本人吃东西的习惯（从过去必须坐着现在偶尔站着）；以及对陌生人的友好微笑（在中国大陆，这已经成为麦当劳优良服务的标志之一）。

有些人非常怀疑全球化的累积加速作用。发生在 10 年前的事情，像“铁幕”的崩溃，引进欧洲单一市场，其影响力直到今天才充分显示出来。1992 年后“泛欧”计划的第

一次调整只促使少数大公司的跨国界联合。但除了换换名字外，并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有些甚至连名字都没变。现在，这些企业已经意识到应进行更切实际的重组——比如，如果陆虎（Rover）被宝马（BMW）兼并却未被纳入欧洲统一的生产体系中，那这场兼并就毫无意义。近年来互联网的超速发展提供了更加生动的例子：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震惊了包括好莱坞、英国舰队街等在内的全球传统媒体的大本营。

这种累积加速也很快在金融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90年代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数目增长了一倍。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金额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50倍。外国直接投资从1985年的500亿美元增至1998年的6440亿美元，并最终达到1999年的8000亿美元的高点。1998年，全球共有6万家跨国企业，设立了50万个分支机构，而在1990年，只有3.7万家跨国企业及17万个分支机构。目前，这50万个分支机构的产值高达11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全球出口总值。国际知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专家们测算出大约全球产值的五分之一，相当于28万亿美元中的6万亿美元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后才可获得。这30年里，随着更多市场（例如中国）和行业（如金融零售服务业）的兴起，五分之四的全球经济都必须参与到全球竞争中。

各种软性数据也开始大幅增长。1978年，当时全球44亿人口中只有2.9亿人出国旅游。而到1996年，57亿全球人口中出国旅游人数达到5.8亿。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数将增至16亿。当今美国60%的最佳物理学论文和30%的最佳生命科学论文是由在美国本土之外出生的科学家完成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创办人